



节用裕民

节用是儒家治世的基本观点,孔子说要“节用而爱人,使民以时”,朱熹说“是以先爱人者,必先节用,此不易之理也”。丘濬为儒家学生,自然也遵循节用之道,但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,丘濬也有所发展创新。

丘濬认为,轻赋必须节用,重敛必缘于奢用。他还提出了轻赋节用的三条办法,一是要编制预算,量入为出,有多少钱办多少事;二是分设内外二府,严格划分权责,皇家不能随意挪用国家的钱;三是定贡献之常,去厚敛苛杂之征,以养民足国,老百姓富裕起来了,国家财政自然有钱。

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残酷。到了明朝中期,朝堂内外奢靡浪费已日渐成风。有一年,部分宦官先后因为进献珍珠得宠,导致民间物价沸腾,珍珠价格暴涨,商人趁机牟利。见此场景,耿直的丘濬坐不住了,他直接向皇帝建议:对于专门进贡珍稀器物来请赏的人,请皇帝您不要接纳,不能在器物营造上奢靡浪费,这样您才能远离小人。

丘濬还从各个角度给出削减财政超额开支的方法,他上奏皇帝道:对官员的赏赐遵循旧例,勿使财政开支过大;不要扩大宫室王陵的体量,建议以修代建,不可挪用备灾之物;不要大修寺观,切勿因此靡费财力、征伐民力……不知道孝宗皇帝对这些絮絮叨叨的建议作何感想,只是丘濬一直在坚持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

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。到了明朝中叶,空谈的风气在朝野内外蔓延开来。明代中期,空谈思想泛滥,文人越来越缺乏对天下家国的关怀,士大夫们关注的问题与实际情况偏离,逐渐走向墨守成规、僵化教条,务实的风气得不到发扬。

客观上说,丘濬是一个传统的孔门弟子,喜欢从古代寻找办事依据,特别是他继承了朱熹的思想和学说。但对于儒家理念特别是程朱理学,他并非一味接受,而是师古不泥古、师心不师迹。丘濬格外强调“用”的重要性,强调经世致用、实干兴邦。

丘濬从少年时代起便注重于务实。他曾自述,他年少时就有志于“用世”,对户口、边塞、兵马、盐铁这一类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格外感兴趣。后来他作诗的风格、为文的气派、为官的理念也与此一脉相承,讲求实用。

作为一个务实主义者,丘濬把国家和天下的各式问题都综合在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中,将其上呈孝宗皇帝,以期能匡时救弊。丘濬劝诫皇帝道:我编这部书,您照着学习,它就是一个格物致知的方法,您要是照着里面所写的去实践,那它就是治国平天下的要领。可见,丘濬是希望以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实现经世济国的理想。

务实笃行

学习古人的知识,但不能被古人所束缚,要根据实际灵活运用。

